

《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 觅踪中国第一王朝之旅

马龙

古典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夏王朝。在中国,对夏王朝的探索从考古学诞生之初,就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核心主题。而日本学界也一直有学者进行着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2023年出版的日本考古学者冈村秀典先生的《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以下简称《夏王朝》)就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夏王朝觅踪之旅。

《夏王朝》前两章是对古典文献的爬梳与分析。冈村先生在第一章梳理了从战国到汉代的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侧重知识罗列。第二章则试图将这些记载放置在当时的背景下去分析。通过前两章,冈村先生发出了仅依据古典文献觅踪夏王朝“有太多的限制”的感慨,引领着读者将期望集中到了考古学上。

读罢前两章,可以感受到冈村先生的主张是脱离古典文献构建的历史学框架,让考古学独立发挥自己重建历史的本领。其心可鉴。但冈村先生在第二章采信了即便在日本学界也多受批评的平势隆郎的“夏朝史事多由战国时代依据政治动机篡改”的观点(吉本道雅、浅野裕一、小沢賢二、渡边英幸、野间文史都曾批评过平势隆郎,即便冈村秀典本人也曾批评过平势隆郎关于《春秋谷梁传》的说法),实在有失水准,令人惋惜。

第三章是“考古学的探索”。冈村先生先是从甲骨文的发现说到殷墟的发掘,称赞考古学家用无可否认的证据证实了商王朝和商晚期王都的存在;接着从郑州商城的发现叙述考古人对殷墟以前商王朝都城样貌的探索;最后从二里头遗址和王城岗遗址的发现,转到邹衡先生的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论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王朝起于龙山文化晚期说”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将读者觅踪中国第一王朝的目光集中到了二里头文化上。

第四章是以宫殿、铜器和玉器为突破口论证二里头王朝的王权结构。冈村先生指出二里头王朝建立的背景是社会分化日益加大,为维系自身利益和稳固社会秩序,二里头王都的贵族设计了一套祭祀一体的王朝礼制在二里头文化聚落贵族间推行,包括王室行政和举行宫廷礼仪的宫殿、用于显示威仪的铜武器、用于宫廷礼仪的瑞玉和铜礼器、伴随宫廷礼仪而生的饮酒礼仪。王朝当政者恩威并施,一方面试图以礼制规范来维持自身与各聚落当权者之间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广修武器,通过征伐战争以压制违背礼制的

聚落。同时,贵族们通过不断压榨庶民挖掘壕沟、夯筑基址、建造宫殿、制作铜器、玉礼器和武器来维系国家权力的基础。

一个王朝的全景绝不能止于宫廷和贵族,考古学觅踪中国第一王朝的脚步也并未止于宫殿和大墓。《夏王朝》第五章是对二里头文化时期人们生活的研究。动植物考古的研究表明,二里头王朝的人们是以粟、黍、水稻和大豆为主食,也种植了小麦,驯养了猪、牛、羊、狗等家畜,可谓五谷丰登、四畜兴旺;并且,始终坚持通过狩猎和捕鱼以获取多样的肉食,在二里头时代人们的饭碗里,也会出现鹿肉、兔肉、熊肉、鸡肉、猪肉、鲤鱼等。在二里头时代的厨房里,用于烹饪的陶器常常是夹砂罐、鼎和鬲,此外还有蒸饭或蒸米酒用的甑,研磨块茎植物的刻槽盆等。二里头的贵族们喜爱饮酒,除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鬶、盃之外,还创造了爵、觚、大口尊等多种新酒器用于王朝饮酒礼仪,这些酒器也有少部分“飞入寻常百姓家”。

《夏王朝》第六章指出,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影响力增强,周边地区不断被二里头文化吸引,出现了不同于龙山时代多方向交流网络的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辐射式交流模式。冈村先生又根据“二里头文化因素在接受方中占次要地位”,且不同受纳方选择的文化因素并不相同的现象,指出这种交流实际“是各个地区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主动且有选择的接受”。尽管如此,这种始现于二里头时代的辐射式交流模式最终推动了神州大地上中心王朝和周边关系的形成,并延续了近四千年之久,二里头王朝无愧中国第一王朝。

冈村先生在《夏王朝》第四到六章中通过扎实的考古学知识论证了在商王朝之前确实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王朝的王权政体,即二里头王朝。并且论述了二里头王朝的国家体制、宫廷礼仪、王权结构、社会面貌、文化影响等内容,肯定了二里头王

朝是中国最初的王朝。这是冈村先生考古学研究的成功之处。但冈村先生并未成功论证二里头王朝与夏王朝有关,此书标题中的“夏王朝”三字和此书终章“那就是夏王朝”(205页)的论断显得有些突兀。

如果此书是冈村秀典先生2023年的新著,那么此书应当得批评。但此书实际上是冈村先生《夏王朝 王權誕生の考古学》2007年日文再版的中文翻译版。此书的日文初版于2003年刊发。底稿则更早,应是冈村先生在2002年国际东方学者研讨会上所作《中国王权的形成——二里头文化的探讨》(210页),原始立论就是以二里头文化贵族如何利用宫殿、铜器、玉器为突破口论证中国王权的形成和二里头王朝的成立,立论的初衷与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夏王朝是何面貌并无直接关联。是由于讲坛社以“夏王朝”为主题向冈村先生发出了执笔委托,他才在书稿前两章增添了夏王朝相关的内容(诚如冈村先生在绪言第9页所述,前两章“没有什么新颖的内容”)。冈村先生实际上是主张放弃文献传统,依靠社会考古学另起炉灶的(李旻,《读书》2023)。所以,为更好地理解冈村先生对中国文明原像的认识,跟上冈村先生觅踪中国第一王朝的脚步,不妨参考译者秦小丽教授的建议,即首先从第三章开始阅读此书(246页)。只不过,依照此路径的结果可能是觅到了二里头王朝的踪迹,却丢失了夏王朝的踪影。对于冈村先生如此设计觅踪中国第一王朝之旅的尝试是否成功,就要看读者的判断了。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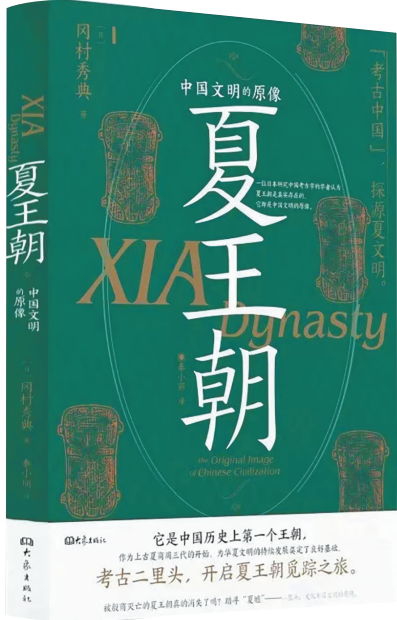
《夏王朝:中国文明的原像》

作者:[日]冈村秀典

译者:秦小丽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2月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它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考古学的重要成果。
考古二里头,开启夏王朝觅踪之旅。
夏王朝是中国文明的原像。

文化谱系理论的实践与拓展

——读《传说时代的南土文明:屈家岭文化》

伍腾飞

单思伟先生的《传说时代的南土文明:屈家岭文化》(以下简称《南土文明》),是一部以类型学、层位学为基本方法,文化谱系为指导理论,考古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笔者在拿到书之后,常常翻阅,受益匪浅。

全书除去“绪论”及“结语”,一共七章,分别为“文化界定”“遗存分析”“分期与年代”“地区类型划分与时空分布”“屈家岭文化的形成”“屈家岭文化的发展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屈家岭文化的流向”。这里按照章节对本书进行介绍,并着重于书中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思路及方法。

第一章“文化界定”,作者针对目前学术界对屈家岭文化的界定存在的“各有差异”“内涵模糊”的情况,指出需要在谱系理论层次理解考古学文化,放在较长时间段、较大范围内进行讨论。书中选择分布于汉东平原的五处典型遗存,进行分类研究以及文化界定,并从中归纳出屈家岭文化的内涵。这里典型遗存的判定标准,无疑是借鉴意义的。所谓典型遗存,一是文化发生、发展的核心遗存;二是同一遗址最好存在层位上有叠压关系的两类及以上且较为丰富的遗存。在面对“较大区域范围内历时较长且包含多种不同文化”这一复杂情况时,通过对典型遗存的分析,往往能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

第二章“遗存分析”,书中按照文化面貌并结合自然地理区划,对屈家岭文化遗存进行分区。具体每一分区,作者又重点对典型遗址出土的典型陶器做型式分析,以确定分段标尺,再通过同类器的对比,来对其他遗址进行串联。

第三章“分期与年代”,首先归纳屈家岭文化中反映文化特征结构的典型器类的演变序列,据此对各地区遗存进行年代上的串联,最后形成文化的整体分段。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认为遗存分段与文化分期属于不同层面的概念。书中指出“考古学文化不等于物质文化,故文化的分期并不等于简单的时间分段,其往往还指向了某种文化自产生、发展到瓦解的整个过程的态势”。具体到书中,屈家岭文化第一、二段主要以经营长江中游地区为主,小范围突破到上游的阳信地区,这一时期是文化的形成与稳定期;屈家岭文化第三、四阶段,呈现出大范围的对外扩展的趋势,影响到了更大范围的文化格局,是屈家岭文化的繁盛时期。据此,作者再结合典型陶器的演变序列,将一二段定为屈家岭文化早期,三四段定为屈家岭文化晚期。文化的分期不是对器物群演进的简单的归纳,物质层面的分段,还需要与文化发展态势相结合,这一点体现了《南土文明》对“文物见人”这一考古学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坚定实践。

第四章“地区类型划分与时空分布”,考虑到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及文化交流的差异,屈家岭文

化在各地区的文化面貌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个性因素,这些个性因素或成为划分地方类型的依据。而后在“时空分布”一节中,以“文化圈的尺度”讨论了屈家岭文化各类型的分布与发展的动态过程。

命名混乱的情况在史前考古研究中并不少见,也包括对同一文化内部不同类型的命名。《南土文明》对地方类型的划分遵循了“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无论是一个墓地或居住遗址)的小地名作为”的命名原则,“所谓典型遗存,是指同类遗存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存”,使用遗存丰富、特征明显、具有代表性的遗址点来对地方类型进行命名,易于被接受,另外,笔者认为既有的文化命名所依托的遗址为典型遗址,且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的,则不宜随意改之。依此则可减少文化命名混乱的情况。

第五至七章,作者在文化谱系理论的指导下,对屈家岭文化的形成、发展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流向做了细致、具体、动态的分析。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言:“……文化传播和迁徙是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并在它的作用下,考古学文化之间大量出现了文化渗透、借用、融合及同化,和考古学文化的分化,使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成了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即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结合成统一的考古学文化。”

作者在讨论屈家岭文化的形成时,摒弃了单线条的追溯同一分布区域前一个阶段的文化做法,而是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更长的时间跨度下思考文化形成的背景和动因。首先从历时性的角度,上溯屈家岭文化形成前的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格局,然后再从共时性的角度揭示了这一时期该地区及相邻地区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发展态势与互动关系,从而明确了屈家岭文化形成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讨论文化互动的时,是在文化期的这一“小尺度”下进行的,使得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路线更为清晰与明了,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如“屈家岭文化的发展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一章中,作者论证屈家岭北上扩张的路线,可具体分为三条,从历时性的角度对相关典型遗存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而后将各个遗址点串联起来,最后为读者呈现出“南土文明”“逐鹿中原”这一段有血有肉的“文化历史”。

除了文化期的尺度下,揭示不同文化或者同一文化内部不同区块(空间类型)之间的互动

外,《南土文明》一书还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整个长江中游及其周边地区,在考古学文化这一“大尺度”下探讨大区域内的文化格局的变动。如作者在汉西文化、汉东文化系统的基础上,提出北方文化系统的概念,通过对前后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梳理,归纳出汉东文化系统向汉西至峡江地区的逐步推进的五个阶段,最终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汉东文化系统完成了长江中游地区的全面控制。再如“结语”处,作者总结性地提出仰韶时代晚期前后,中国境内主要地区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格局变动的观点。

作者认为文化谱系理论不仅重在揭示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即文化的发生、发展、瓦解或消亡的全过程,并辨析其源流,还需要从区域文化互动中找到文化变迁的外部动因。这一理念贯穿了对屈家岭文化研究的全过程。如在探讨屈家岭文化的流向时,作者将视野放置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广域范围内,关注较大范围内的文化格局的变动及文化态势发展,致力于找到推动屈家岭文化蜕变为石家河文化的背后“推手”。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进程中的一座高峰,《南土文明》则将这座高峰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动态过程,生动形象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了解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变迁提供了一个窗口。作者论证时从细处入手,对典型遗存的分析入微,特别是对不同文化之间“模糊边界”地带遗存的文化内涵的讨论与判断,体现了科学严谨的治学风格。同时,开阔的研究视野与思维,使得研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能够跳出器物组合看到文化格局的宏观变动及其背后的动因,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地方。

以上,笔者认为《传说时代的南土文明:屈家岭文化》一书体现了作者对文化谱系理论的深入思考与坚定实践,书中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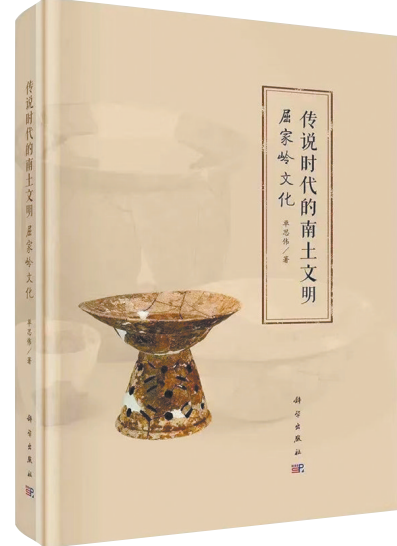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传说时代的南土文明:屈家岭文化》

作者:单思伟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学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可整体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介绍、解读某一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理念、模式、模型等;二是在介绍、解读基础上,运用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阐释和剖析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和原因,抑或是吸收借鉴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用于指导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其间不乏对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普适性的反思和批判;三是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进而将其上升至方法和理论高度,尝试构建适配于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上述研究中,纯粹的、完整的理论性研究著作还较为稀少,汤晔崢先生的《城镇文化遗产保护路径优化研究》一书即属于此类。该书在研究视角、理论支撑、研究结论等方面均表现出开创性。

研究视角与理论支撑

《城镇文化遗产保护路径优化研究》一书并不是围绕某一具体的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理念、模式、模型等等而展开的研究,而是将“文化遗产保护”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引入行为学理论,将文化遗产保护视为一种行为。同时,基于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又引入系统论,将文化遗产保护行为视为一个系统。

行为和系统论作为理论支撑,搭建起了本书的研究框架,相关概念和方法贯穿本书始终,用于描述、说明、阐释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各项表征和动因。譬如,参照系统论已有成果,作者阐明了文化遗产保护系统的构成要素、要素之间的关系、构成要素的运动特征和动因,以及系统的整体形态特征,从而得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系统为原型系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系统为衍化系统的结论,进而综合两类系统,提炼出文化遗产保护的混沌范式。再如,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行为学特征,作者根据行为规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分类,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概念,用于类比和阐释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路径和非主导路径,并据此提出优化路径建议。

本书是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的一次开创性尝试,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视角认知国际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理解发端于欧洲大陆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出现排斥异化现象的原因,进而认识到欧陆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仅为历史性、阶段性、地区性成果,更进一步意识到构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该书作为理论性研究专著,自然不乏大量概念的提出、推演以及概念间关系的辨析论证,其间无不彰显着语言的微妙和精妙以及哲学思辨精神,彰显出作者文字驾驭和逻辑推导功底之深厚纯熟。

研究思路与主要结论

全书绪论之外的逻辑关系为原型结构研究—衍化形态研究—优化路径建议,分别对应目录中的国际城镇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型、中国城镇文化遗产保护的衍化、城镇文化遗产保护的模型三大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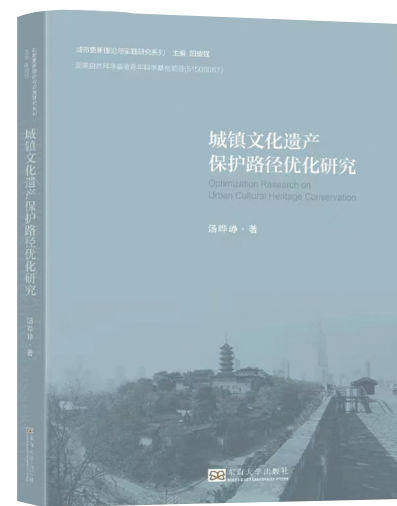
国际城镇文化遗产保护的模型

第一至三章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原型结构研究。第一、二章梳理总结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作者将发展历程划分为欧洲萌芽期和全球成型期两个阶段,分别阐述了两个阶段的文化遗产保护构成要素,即价值取向与思想背景、保护对象与时空边界、保护方法与技术标准、社会建构与运行机制、普适价值与国际准则五个方面的演化规律,进而在第三章总结提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时空维度演化规律、要素因子演化规律及其系统形态特征。主要结论包括,关于时空维度的演化规律,作者提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历程,无论是欧洲阶段还是全球阶段,均是一个“批判—建构的往复过程”,是一种“稳定—嬗变的共生运动”。关于要素因子的演化规律,从欧洲萌芽期到全球成型期,价值体系、对象构成、方法技术、运行模式、普适价值均呈现出各自的演化规律。价值体系从“二元对立”到“相对多元”,对象构成从“时空界定”到“价值阐释”,方法技术从“终极目标”到“持续发展”,运行模式从“对立博弈”到“协商合作”,普适价值从“绝对理念”到“突出普遍”。基于两个阶段文化遗产保护的时空维度演化规律和要素因子演化规律,作者提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系统的形态特征,一种“网络化的关联系统”,一种“聚核式的运行结构”。

中国城镇文化遗产保护的衍化

第四至八章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衍化形态研究。第四章梳理总结了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作者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城镇文化遗产保护路径优化研究》 评价 曹文哲



历程划分为文化兴国时期、政治为纲时期、市场中心时期、社会和谐时期四个阶段,提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属“后发外生”型,是“自觉”而非“自发”行为。四个不同阶段形成了两类保护路径,即文化主导路径和制度主导路径,并着重分析了制度主导路径的现实形态。第五章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爆发的两次公共事件,即南京老城南事件和南京护树运动,提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在制度主导路径下,还存在两种非规范路径,即精英式路径和大众化路径。第六、七章从价值整合和成效共识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衍化的深层影响因素与“原型”异化机制的成因原因,即文化原型冲突和城市范式冲突。文化原型指的是群体本位,“生生”法则、家国一体等思想观念,以及嵌入社会制度的经济系统发展模式等。城市范式指的是天人合一的城建理念,“家国同构、明分使群”的城乡组织结构,“文明以止、化成天下”的城市空间打造等等。第八章总结提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的运动特征、保护路径的形态特征以及保护衍化结构的形态特征。主要结论包括,关于保护路径的运动特征,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批判—建构的往复过程”不同,作者提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路径是一个“基点—范式的线性过程”,是一种“涵化的博弈运动”。关于保护路径的形态特征,作者提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路径形态呈现出保护理念的价值离散和保护运行制度的统合特征。因价值离散而产生的价值碎片被运行制度统合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基于保护路径的运动特征和形态特征,作者提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衍化结构的形态特征,一种“突进式的整合系统”、一种“断裂式的分叉结构”。

城镇文化遗产保护的模型

第九至十一章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优化路径建议。第九章综合前文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原型系统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衍化系统的分析,借助系统运动理论,作者提出文化遗产保护行为为一项混沌运动,而文化遗产保护系统则是一个混沌系统,即有序与无序共存、运行结果不可预测、但运行规律可分析掌握的混沌系统。第十章中,作者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路径中产生的“权宜”“脱嵌”“涵化”现象进行了反思,根据文化遗产保护系统的运动模式,从目标态和结构式两方面建构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想模式——混沌范式。第十一章依据混沌范式,作者提出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路径优化的技术措施,围绕价值干预,包括基于文化遗产本体的价值判定干预,基于涵化目标的价值保护干预,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监控干预。

当前反思与未来展望

关于未尽之处,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回顾与展望”一章中实事求是地指出,论文在混沌范式建构和实践运用两方面仍存在不足。针对混沌范式建构,作者认为,论文对混沌范式的建构还较为粗糙,某些部分甚至存在争议。比如,文化遗产溢出机制可能会合文化重建行为,导致大规模的仿古建筑。针对实践运用,作者提出,混沌范式并不能直接解决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还需与实践结合,从而实现理论建构、实践应用、结果反馈的良性循环。

关于未来展望,该书虽作为理论研究专著,但并不是无根之木,相关结论的得出主要建立在城市中心区建筑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之上。因此,书名为《城镇文化遗产保护路径优化研究》,这促使我们反思,非城市中心区、非建筑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其演化规律是否也符合上述结论,其演化过程是否存在类似问题,这可能仍是未来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领域尚待拓展的方向。另外,作者虽以城市中心区建筑类文化遗产作为研究范畴和实践来源,但在初心和愿景上更期待将研究范畴和实践来源,或者说业内研究和学科发展扩展至整个城市的规划设计、推动理论研究,建立起适配我国国情的文化理论和城市规划理论体系,进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正值全球、全要素、全过程的国土空间规划转型时期,我们需要构建怎样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文化遗产作为国土空间资源中具有文化意义的不可再生类型,又该作出怎样的回应,均将成为未来理论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城镇文化遗产保护路径优化研究》

作者:汤晔崢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4月